

● 环球随笔

布拉格与卡夫卡^①

[法] 陈力川

有的城市,你无论去过多少次,总还是觉得陌生;有的城市你第一次去,就已经熟悉。前者如布鲁塞尔,后者如布拉格。有人说布鲁塞尔缺少和谐一体的风格,其实它真正缺少的是一颗灵魂。这一点就连欧盟和北约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也无济于事。布拉格也没有和谐一体的风格:中世纪开始建造的城堡,哥特式的天主教、犹太教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皇家花园,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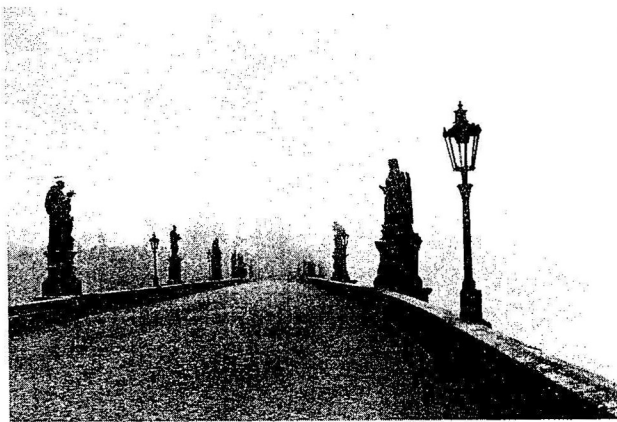
巴洛克建筑

修道院……可是你觉得所有这些刻写着不同时期历史的建筑有一

① 谨以这篇短文追念卡夫卡逝世八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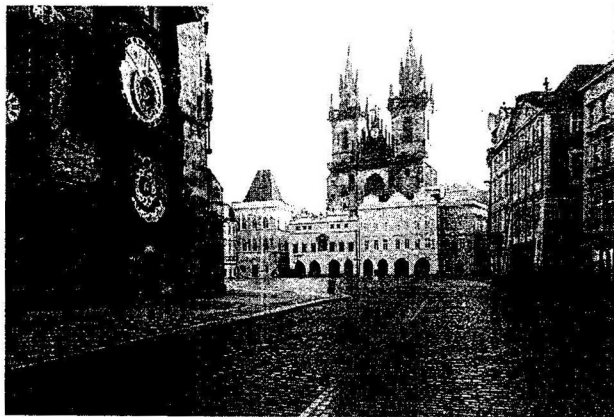
颗共同的灵魂,它的名字就叫布拉格。

白天的布拉格属于音乐,城市只是演奏音乐的舞台,特别是爵士乐和摇滚乐横贯大街小巷,而音乐厅和歌剧院则是古典室内乐和交响乐的天下。晚上的布拉格只属于它自己,人不过是城市的活动布景。白天不起眼的路灯和建筑物的照明灯一下子让布拉格换了一副面孔。“查理桥上能使人激动的圣像”也忽然从黑暗中醒来,引导游人寻着夜光走进它们的世界。人去桥空的时候你已经如醉如痴,不知是你忘记了睡眠,还是睡眠忘记了你,反正没有比眼前的景色更美的梦,“当下”对你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你想与伏尔塔瓦河(Vltava)一起迎接日出。



查理桥

白天你一遍遍地漫步在老城广场,这是一个有磁力的地方,你没走多远一定会被它从不同的路线吸引回来,而每一次都像来到一个新的地点。这一带的房子都穿着色彩明亮的巴罗克服装,它们并排立在你面前,既是凝固的音乐,也是流动的建筑。它们太漂亮,太快活(至少表面上如此),使你和卡夫卡的布拉格对不上号。你想象卡夫卡的布拉格应当是在黑白照片上或夜晚看到的那样,有的是老旧的美,还有必不可少的神秘和忧伤,就像照片上卡夫卡



老城广场

的那道目光。一生中有多少次你真觉得想象的事物比亲眼看到的还真切,不同的是有时你希望是这样,有时你希望不是这样。

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出生的地方位于老城广场圣—尼古拉教堂旁,当年的房子 1897 年毁于祝融之灾,人们现在看到的三层楼房建于 1902 年,只保留了

原来建筑的大门。1965 年,卡夫卡故居转角的墙上镶嵌了一个纪念头像。这个曾被捷克共产党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作家”,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时候,被自由派学生奉为反极权的“存在主义大师”。其实“革命作家”和“存在主义大师”都是后人给卡夫卡戴的帽子,伟大的作家不接受意识形态的分封,就像那尊雕像上的卡夫卡,头发挺立,一副不喜欢戴帽子的



卡夫卡头像

样子。

在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布拉格是奥匈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二十三万,其中 90.7% 是捷克人,9.3% 是德国人。在讲德语的布拉格人中有极少数犹太裔人,卡夫卡的父母就属于这个少数的犹太人团体。因此卡夫卡从小同时接触到四种文化:德意志文化



尼古拉教堂

是他的母语文化,捷克文化是他所处的社会的主流文化,犹太文化是他的种族历史文化,奥地利文化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政治地缘文化。卡夫卡短短的一生能取得无远弗届的文学成就,不能说与多种文化的浸染无关。卡夫卡的朋友若阿奈斯—乌尔兹迪(Johannes Urzidil)就说过:“实际上,卡夫卡的消失标志着从捷克—日耳曼—奥地利—犹太混合体中产生的布拉格知识界的结束,这个混合体曾在几个世纪中起着支撑和激励布拉格的作用。”^①

卡夫卡常常被人描写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通常举的例子是卡夫卡临终前叮嘱好友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悉数销毁他的作品(悉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卡夫卡生前已发表了四十多篇短篇

① 本文的引文,除特别注明以外,均出自 *Franz Kafka et Prague* 一书, Harald Salfellner 著, Vitalis 出版社, 1998 年版。

小说。他要“付之一炬”的可能是那三部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卡夫卡缺乏自信可以从发生在学生时代的两件事上看出端倪。一是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中学会考前一年的忧虑:

我担心通不过年终考试,无法升级;即使我作弊通过了考试,我还是担心中学会考时遭到不可挽回的失败。再加上我出奇的无能早晚会被我父母(还有其他人)发觉,这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现在由于我的成绩稳定,他们失去了警觉。

卡夫卡中学的成绩单显示,头三年他在全班名列前茅。唯一比较差的是数学,即使参加补习班也无济于事。但情况远没有他担心的那么糟糕。“我出奇的无能早晚会被我父母(还有其他人)发觉”,这是那个时期他对自己悲观的看法。第二件事是他上大学的專業选择。1901年,卡夫卡通过中学会考后,先是在布拉格大学化学系注册,两个星期以后转到日耳曼文化研究院,一个学期以后又转到法律系。卡夫卡似乎看不清自己的未来,法律作为最后的选择仍然不是他的依归。马克斯·勃罗德回忆卡夫卡在那个时期的摸索时说:

他是无可奈何才学法律的,这是一个最不确定的专业,可以是毫无目的的,也可以达到多种多样的目标(担任律师或公职);总之是一个可以推迟决定的专业,而且也不要你有什么特别的志向。

志向,卡夫卡是有的,但不是当法官或律师,而是写作。其实命运安排他学法律,最终却成就了他当作家的志向: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与不着边际的法律使看似无辜的人受到惩罚的主题有关,他无法回避在他的小说中扮演律师或法官的角色。眼下,在他羞涩的外表下蕴藏着现实和想象两种力量。现实的力量推动他攻读法学博士,想象的力量催迫他动笔写作,他一身同时接受了这两

个挑战。卡夫卡在给他的朋友奥斯卡·帕拉克(Oskar Pollak)的信中说:“一本书应当是一把斧头,砍向在我们身上结冰的海。这就是我的信念。”卡夫卡第一次拿起这把斧头破冰的时候,是在1903年至1904年秋天的那个学期,当时他只有二十岁。书的名字叫《一次战斗纪实》,讲述一个寒冷的冬夜,两个喝了酒的年轻人在布拉格街头的漫游,这是卡夫卡青年时代一篇充满浪漫气息的小说,表达了年轻人对爱情的犹疑:

您知道,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通过行为不端或轻浮不忠或远走他乡来随时结束这个刚刚萌生的爱情。因为我非常犹豫不决;我真的怀疑我是否应该沉浸在爱的激情之中。这是没准儿的事,谁也不能准确预见其结果和期限。^①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查理—费尔迪南德语大学的礼堂获颁法学博士。这所大学始建于1348年,是中欧地区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担任校长期间开始扩大波希米亚人在大学领导阶层的比例,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波兰的少数民族受到排斥,造成历史上查理大学的第一次分裂,许多学生和教授出走。1622年,耶稣会教士掌管教权,宗教异端分子一度云集查理大学。十九世纪,查理大学成为民族和政治冲突的舞台,终于分裂为捷克语和德语两所大学。1939年,在“德意志帝国保护人”的敕令下捷克语大学被迫关闭;1945年,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宣布关闭德语大学作为报复。二十世纪,查理大学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过程中也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要论一所大学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世界上可能只有北京大学可与查理大学相比。

^① Kafka, *Œuvres Complètes*, Volume 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80, p. 44.

今天在布拉格十字军广场上可以看到1848年查理大学五百年校庆时竖立的查理四世身着皇帝加冕礼盛装的雕像,他的右手拿着查理大学的建校法令,雕像高3.79米,底座四面的壁龛中嵌有代表建校时四个学科的图案:正面是神学,后面是哲学,左面是



查理四世

医学,右面是法律,四周还有布拉格首任和第二任大主教,查理皇帝的救助人和圣一居伊教堂的建筑师的塑像。整个作品系由雕塑家汉德尔(E. Händel)设计,为纽伦堡皇家铸工铸造。看着查理大学缔造者的雕像,我自然想起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既然蔡元培校长,李大钊教授的雕像都已经竖立在校园之中(那是我们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的捐赠),为何不竖立一个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缔造者光绪皇帝的雕像呢?尽管北大的确切校庆日至今莫衷一是,但光绪帝于1898年诏谕准建京师大学堂的史实并无争议。参照查理皇帝纪念组雕的创作者汉德尔的设计,还可以将在《公车上书》和《请开学校折》中向光绪进言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康有为,光绪帝任命的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严复和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继任校长蔡元培作为纳入组雕的四个人选。不知道我的这

个倡议能得到多少北大学子的赞同。

卡夫卡得到博士后,先是在一家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上班。这家公司的地点位于布拉格最开阔、最繁华的圣一旺塞斯拉斯广场19号。整个广场大街正对着捷克国家博物馆,是后来“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的发源地。圣一旺塞斯拉斯是传说中斯拉夫公主丽布斯(Libuse)建立的布拉格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国君,在位时间是公元921年至935年。他本是一个受民众爱戴的好国王,但不幸遭一心篡位的兄弟派人谋杀。卡夫卡在这家保险公司的工作时间长,薪水低,假期少,显然不能满足他写作的愿望。此外,卡夫卡身体羸弱,不堪负荷,一米八十二的身高,体重只有六十二公斤。卡夫卡在《一次战斗纪实》中写的那个主人公很像他自己:

我的体质虚弱,您看,我要挺直身体非常困难。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个子太高。^①

1908年,卡夫卡调到他同学的父亲担任总经理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每天上班时间是早八点到下午二点,而且薪水不薄。卡夫卡很快得到公司同事和上级的赏识,职务不断升迁。这个时期,卡夫卡还经常出入咖啡馆(Arco, Kontinental, Louvre, Radetzky),与布拉格文学艺术界的朋友频繁往来。孤独和交流是在每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两种需求,卡夫卡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咖啡馆的好处:

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交谈,互相端详,彼此并不相识。这是一个每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品尝的宴席,任何

^① Kafka, *Œuvres Complètes*, Volume 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80, p. 11.

人都不会不自在。你可以在那里露面,之后销声匿迹,不必向主人辞行;而每次人们都是愉快地接待你,绝不掺杂半点儿虚伪。

1912年卡夫卡第一次进入写作的多产期。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1927年勃罗德将它发表时改名为《美国》)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卡夫卡在9月的日记中写道:“《判决》这个故事,我是在22日至23日的夜里,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一气呵成的。由于坐了一宿,我的两条腿麻木极了,勉强从书桌旁站起来。极度可怕的快乐,随着这个故事在我面前展开,我就像在一片水面上行进。在这个夜晚,有好几次,我的身体被自己的重量压弯。就像一个敢做敢为的人,我为所有人,为所有稀奇古怪的想法之产生、消失、再生准备了一个火盆。……当仆人第一次穿过候客厅的时候,我正在纸上写完最后一句话。关了灯,天已发亮。胸部隐隐作痛,疲劳在半夜消退了。我颤抖着走进妹妹们的房间,大声朗读。之前我在仆人面前伸着懒腰说:‘我写了一夜’。她看到床一动没动,跟刚铺好的时候一样。通过写作的行为,我不无羞愧地触到了写作的真谛,这一信念终于得到证实,人只能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写作,身体和灵魂全部开放。整整一个上午我都躺在床上,但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卡夫卡这段简单的文字将我们带进他写作的真实境遇,我们好像跟他一起熬过《判决》的通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卡夫卡的几个朋友应征入伍,上了战场,卡夫卡因保险公司的工作离不开而幸免。但他多次表露想去当兵的念头,同时在日记中又对战争以及“令人作呕的爱国游行”表示反感。其实卡夫卡正独自进行着另一场战争,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如何,我要写下去;这是必须的;这是我保持自己的一场战斗。”《诉讼》(审判)、《乡村教师》、《代理检察长》和《少年教养院》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诉讼》可能是卡夫卡拥有

最多读者的小说。银行职员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他思前想后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法,感到无辜受辱。直到最后他默认有罪,甘愿伏法,也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从未亲眼见过审判他的法官,官司也没打到最高法院。看来卡夫卡是希望读者来回答这些近乎荒诞的问题。读者从约瑟夫—K的经历中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只知道他是一个称职的银行职员,与经理的助理



三十一岁时的卡夫卡

有点不和;三十岁还是独身一人,每星期与一个夜总会的女侍者约会一次;三年没去看望过独自在外省生活的半失明的母亲,不过每个月都请一个堂兄去送钱。总之,他是一个似乎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人,一个现代社会平庸的小资产者的典型。他万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将生活建立在错误的价值观念上,追求外在的偶像和个人的声誉,忘却了人真实的存在。他犯的罪就是甘愿被社会所异化,那个他无论如何搞不清楚的法律不是别的,正是生活的本质,一条内在的法律。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都有罪,都可以被判刑,因此被审判的肯定不是约瑟夫—K一个人。卡夫卡写的这个人物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他犯的罪却不是一般法院可以受理的案子,而属于良心法庭的范畴(约瑟夫—K最后被处决的时候,刽子手将刀插在他的心上,而且还刺了两下)。对萨特来说,“他人是地狱”,而对卡夫卡来说,他人是法官,法官又是自己,因此他人也是自己。《诉讼》经历了从外部到内部,客观到主观,低级法院(他人)到高级法院(自己)的审理过

程。当两个刽子手在约瑟夫—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来押他赴刑场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厌倦,还是出于无奈,抑或是出于认罪的心理,他跟随刽子手去了,好像并无怨言。

1914年这一年,卡夫卡除了写作还与自己进行着另一场战斗:婚恋。他与一个在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家邂逅的柏林姑娘费丽丝—鲍威尔(Felice Bauer)已经相恋了两年,1914年和1917年双方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或许仍然是孤独与交流的矛盾作怪,在这聚少离多的关系中,他们分开难忍相思之苦,见面难掩失望之情,卡夫卡的文学写作也随着感情的波动而起伏。在卡夫卡看来,作家的职业与爱情和婚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他一直憧憬结婚、建立一个家庭;另一方面,他将孤独视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所以他只能用通信的方式去营造一种“共同生活”。从1912年9月至1917年9月的五年间,卡夫卡给费丽丝—鲍威尔写了大量的情书,仅在1912年10月23日到年底这段时间,就写了一百多封。

战时,卡夫卡一直梦想全身心投入文学写作。当他1917年9月被诊断得肺结核的时候即向公司提出提前退休的要求,结果遭公司拒绝。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1922年1月卡夫卡开始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城堡》。1922年7月病退的申请终于得到公司的批准,可是命运留给他的时日已经无多,9月完成《城堡》的写作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疗养院的病榻上捱过的,他已



卡夫卡与菲莉斯

经无力再写长篇小说,但仍然写出了《地洞》和《约瑟芬,女歌唱家或鼠民》等几个短篇叙事作品。

卡夫卡病中写的《城堡》是他最晦涩的作品。他曾对马克斯—勃罗德说,这部小说的存在“只是为了写而不是为了读”。看来这是一本不求被理解的书,一本真正为自己写的书,卡夫卡甚至在日记中也对这本书的写作讳莫如深。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的经历既简单又奇特。他自称被城堡的伯爵请来工作,但他的档案材料却被莫测高深的行政部门弄丢了。他想求见掌握他命运的城堡第十办公室主任克拉姆(Klamm)先生,但不得其门而入,结果是整天在进不去的城堡和无权落户的村子之间疲于奔命。如果把《诉讼》的主人公约瑟夫—K看作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是降低了这部小说的意义,那么《城堡》的主人公K的故事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犹太人漂泊流浪,无家可归的命运。K最终要寻找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居留证,但他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直到死也没有能将他的身份合法化。马克斯—勃罗德在《城堡》首版的后记中写道:

有一次卡夫卡在我的追问下给我解释了这部小说的结局。这个所谓的土地测量员至少得到了部分满足。他坚持不懈地斗争,但最后死于衰竭。村子的人聚集在他临终的床前,而就在这时,城堡的决定下来了:K不能在村子里合法居住,但鉴于某些附加情形,给予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的权利^①。

这是一个可能但是矛盾的决定。K在村里的居留是不合法的,但生活和工作却得到允许。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卡夫卡那个时

^① Kafka, *Œuvres Complètes*, Volume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Callimard, 1976, pp. 1140 - 1141.

代犹太人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处境。历史上布拉格的犹太人就曾长期受制于压迫性的法律,甚至遭到俄国沙皇的迫害。十六世纪,他们还带着标明犹太身份的黄色标记,受尽屈辱。狭小的布拉格旧犹太墓园在1478年至1787年间竟然葬了约十万人,棺木重重叠叠堆积十二层,见缝插针的墓碑一万二千块。他们的地位在1784年约瑟夫二世赋予犹太人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后才有所改善,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卡夫卡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也不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可选择的道路只有自由职业,例如当医生或律师,这也是卡夫卡学法律的原因之一。卡夫卡去世后,他的同学菲利克斯·威尔兹(Felix Weltsch)在悼念文章中称卡夫卡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而且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这个说法是否能多少印证《城堡》的写作动机呢?



犹太人墓园

自1923年起,卡夫卡辗转求医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住在靠近维也纳的基尔林(Kierling)疗养院。那时肺结核已经侵入喉咙,致使他完全失声,只能靠写字与人交流。1924年6月3日上午,卡夫卡辞世,葬礼八天后在布拉格新犹太墓园举行。他的诗人朋友鲁道夫·福赫(Rudolf Fuchs)写道:

来的人很多。祈祷用希伯来文。他的父母和妹妹不胜悲恸,他的女伴^①绝望的沉默,像死人一样扑倒在墓穴上。天气

① 指1923年卡夫卡结识的柏林姑娘朵拉·黛梦(Dora Dymant)。

阴沉,云雾中不时露出一角青天。上帝保证,我们简直不能相信卡夫卡被埋在那个箱子里,直接仰卧在木头上,卡夫卡,这个刚刚开始出名的诗人。

卡夫卡的墓碑是布拉格建筑师雷奥包德—埃尔曼(Leopold Ehrmann)设计的。灰白的石头,外形类似古埃及的方尖碑,只是下方略窄,上方略宽。这也是卡夫卡的家庭墓穴,他的父母赫尔曼、朱丽—卡夫卡于1931年和1934年相继去世后,与卡夫卡合葬一处。父子关系是卡夫卡一生的心病,1912年他曾经写过一个父亲判儿子投河自尽的故事(《判决》);1919年卡夫卡又在病中写了一封“审判”父亲的信。卡夫卡曾说过:“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他写这封信是为了最终摆脱父亲的威权在他心中刻下的伤痕,是对不可挽回的往事的追忆和宽恕——对这个成功的商人,失败的父亲的宽恕(天下又有几个人是成功的父亲呢?难道做父亲的不都有其失败的地方?需要请求儿子宽恕的地方吗?)。但对于世人来说,这封信却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绝响:



卡夫卡墓碑

亲爱的父亲,有一天你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像往常一样,我不知道回答什么是好,一方面正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感到恐惧,另一方面是因为,要解释这一恐惧的理由,我必须提到更多我无法用平庸的语言表达的细节。即使我在这里用文

字来回答你,也将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就是在文字中,我面对你的恐惧及其后果也几乎使我陷于瘫痪,因为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理智。

卡夫卡的捷克文译者和女友蜜蕾娜—耶森斯卡夫人(Milena Jesenska)在悼念文章中这样评论他的作品:

他的书是年青的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它们真实,朴实无华,满含忧伤,即使充满了象征,仍然发出自然主义的光照。它们在无情的讽刺和敏感中战栗——这个人以如此清醒的目光审视世界,以至于使他对此无法忍受,他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

死神除了召唤他,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几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犹浪潮已经来势汹汹,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马萨里克(T. G. Masaryk)竭力消除民众的反犹情绪,甚至甘冒有损政治生涯的危险,勇敢地为一个遭到无端指控的无辜犹太人担任辩护律师,但仍然无法力挽狂澜。卡夫卡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整个下午,我都在街上,被仇视犹太人的民众包围。有一次,我听到他们咒骂犹太人是败类。难道这不意味着要我们离开这个被人如此仇恨的地方吗(这里就不必去奢谈犹太复国运动和民族认同的感情了)?不顾一切留下来的英雄壮举就像浴室里无法根除的蟑螂一样。我刚刚朝窗外张望,警察增援,宪兵枪上插了刺刀,人群叫喊着散去;我在上面的窗口旁体验着不得不靠人保护而苟活的耻辱。

疾病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生命和文学是无情的摧残,而对于他作为人的尊严却是无比的爱护。二次大战期间,卡夫卡的三个妹

妹都死在纳粹的集中营。如果卡夫卡不幸活到那个时候,难免不遭到同样的厄运。卡夫卡上天有知,或许不会反对命运对他的安排,尽管在当时,这一安排对卡夫卡和他的亲友,尤其对文学是何等残酷。

2004年7月25日,于巴黎

